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邓莹辉,马利远.两宋儒禅关系的演变及对僧诗创作的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3):104-110.

# 两宋儒禅关系的演变及对僧诗创作的影响

邓莹辉 马利远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与儒家和道家一起,共同造就了宋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文化形态。三种文化尤其是儒禅文化互相融合,对宋代禅宗的嬗变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哲学层面看,两宋儒禅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对立到高度融合,再到对儒学淑世精神吸纳,直至渐趋式微的嬗变过程;从诗学层面看,两宋僧人诗学深受儒学影响,呈现出以儒谈诗,强调道本文末,重视语言文字,追求平淡自然诗风等的儒学化倾向;从创作层面看,两宋僧诗除阐释佛教义理外,还宣扬忠孝节义,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具有较强的淑世精神,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不断向儒家靠近的倾向。

**关键词:**儒禅融合;僧诗;儒学化

**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3-0104-07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在唐宋时期获得巨大发展。唐五代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并逐渐合流的时代,而进入两宋,其合流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儒释会通与“三教互补”成为思想文化的潮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宋代乃三教融合的完成时期。但学界普遍认为,所谓三家融汇,更主要体现在儒释两家,两宋包括新学、蜀学、濂学、关学、洛学、闽学、心学等在内的新儒学流派在建构本学派学术体系时,都不同程度接受过禅学的影响,尤其是以入世为特征的程朱理学受禅宗影响巨大。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便认为:“大儒朱熹受二程以后禅之影响,而大成道学。如陆九渊殆融合禅儒立一家之学,以至为王守仁之先驱。”<sup>[1](P159)</sup>这种认识或评价大体符合宋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宋代文学广泛接受禅宗影响是显而易见之事,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已经是汗牛充栋,见多不怪了。但纵观关于两宋儒禅融会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从哲学思想上,多强调禅宗在内容及思维方式方面对新儒学的影响,而对儒学给予禅宗嬗变的反向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在诗学观念上,一味强化“以禅喻诗”的诗学原则,一定程度淡化了儒家传统诗教对禅宗诗学的影响;三是在诗歌创作上,重文人之诗而轻僧人之诗,即便对诸如“九僧”、智圆、惠洪等僧人诗有所关注,其重点亦倾向于具有宗教色彩的作品,讨论其“借诗悟道”的特征。事实上,任何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相互的,尤其在特别重视儒家文化建设的赵宋王朝,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绝不甘心只是充当禅宗的配角,而是充分利用佛学思想的有力武器展开对禅宗的批判,以达到主宰宋代学术界、思想界的目的。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转换一个角度,将两宋禅学和禅诗放在宋代儒学演变的语境下加以观照,展示禅宗因受到居于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压力而发生的新变,以及在诗学观念、诗歌创作上的诸多改变。

收稿日期:2024-10-20

第一作者简介:邓莹辉(1964-),男,湖北巴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地方文化研究。

## 一、两宋儒禅关系的演变

禅宗乃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禅宗经过唐代的发展之后,至两宋进一步走向繁荣。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一起,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中国独有的三教融合的文化形态。对宋人而言,“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是文人所抱持的基本观念。三种文化尤其是儒禅文化互相融合,对宋代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初统治者虽然对释道等宗教思想保持一定程度的宽容态度,并组织官方和民间力量翻译佛经道藏,促进了佛教在太祖、太宗、真宗时代的广泛流传,但出于强化皇权、重振国家权威和加强思想统一的目的,从仁宗朝开始,针对佛教势盛、儒学颓废的局面,儒家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角度出发,继承中唐韩愈的排佛精神,对与儒学鼎足而立的佛、老展开猛烈批判,此所谓“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sup>[2]</sup>。前有柳开、孙复、石介等提倡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排佛道对儒家礼教的破坏。如孙复《儒辱》认为佛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sup>[3](P37)</sup>,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必须加以严厉排斥;石介则以古老的“华夷观念”对佛、道加以批判:“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乱中国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乱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语乱中国之言语,罪莫大焉。”<sup>[4](P71)</sup>“总的看来,北宋前期儒家的反佛,主要集中在礼仪风俗、夷夏之辨、儒家伦理及其佛教对国家财力的危害诸方面。”<sup>[5](P24)</sup>后有欧阳修、张载、二程等思想家,前赴后继,掀起声势更为浩大的反佛排佛运动。欧阳修所撰写的《本论》被视为宋仁宗时期最富战斗性的辟佛著作之一,其中有云:“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常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盖亦未知其方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sup>[6](P121)</sup>文中全面分析了佛教在中国长期兴盛不衰的原因,阐明历代虽辟佛不断,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的根源在于“未知其方”,并提出了“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的改革良方。

面对主流社会儒家学者对佛教禅宗的攻击与排斥,为维护佛教的学术和宗教地位,更是为了生存,

宋初以智圆(976—1022)等为代表的僧人著书立说,通过对道统论、儒家经典、中庸思想以及文学革新理论的认识和探索,对儒家学者的反佛思想和排佛行为予以回击。其主要方法是从理论上将儒佛思想沟通融合,强调儒佛“言异而理贯”“本同而迹异”,从实践上强化佛教“正人心,辨邪正”、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释智圆是宋初第一个站出来迎接儒家学者反佛挑战的一代名僧。他自号中庸子,自幼喜读儒家书,有极高的儒学修养。他针对儒释交锋中出现的“世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儒为戏”的问题,首倡三教融通:“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sup>[7](P99)</sup>他认为儒释互为表里:“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伸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sup>[7](P110)</sup>在两宋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个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的主张。他对儒家经典《中庸》的解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陈寅恪先生称其“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sup>[8](P252)</sup>。钱穆先生亦云:“唐李翱以来,宋人尊中庸,似无先于智圆者。”<sup>[9](P30)</sup>智圆借助对儒家经典《中庸》的阐释解读,试图沟通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中道义学,从而为宋初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沟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伦理的五常,认为“五戒与五常同归”<sup>[10](P539)</sup>。这些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宋初佛教的儒学化,为佛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得了空间,同时也影响了宋代新儒学的形成。孙昌武对其在儒释思想交流史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佛教徒身份而热衷儒事,明确提倡儒释合一,体现了当时儒释双方理论相融的大趋势,又代表了教团内部出现的一种新思潮。”<sup>[11](P121)</sup>

宋初以“太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佛学的排斥出于重建儒家文化秩序的政治目的,但因其对禅学本身的了解相对有限,故其使儒佛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从北宋中后期开始,随着文人士大夫与僧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人对禅宗的了解亦愈加深入,并通过吸收禅学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以建立新的儒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影响宋代哲学、文学和诗学的禅悦之风,甚至造成“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sup>[12](P954)</sup>、“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sup>[13](P470)</sup>的局面。张方平、司马光等人的感叹充分说明,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儒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而造成这种改变的关键人物当属释契嵩(1007—

1072)。作为北宋中期力挽反佛狂澜,提倡儒佛会通而扭转儒佛关系乾坤的最有力者,“契嵩并不是单纯修习禅法的普通禅僧,而是精通儒典、能文善诗、熟谙应酬的一代文僧,具有宗教活动家的风范”<sup>[10](P542)</sup>。有趣的是,契嵩的生卒时间与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完全重合,而欧阳修正是当时排佛最激烈的人物。作为一个饱读儒家典籍的方外之人,契嵩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家经典进行探索,奋笔作《原教》《孝论》等,与当时排佛人士辩论,为佛教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契嵩有关儒释会通的思想十分丰富,张立文先生将其概括为“五戒”与“五常”等同、以善恶论性情、盛称“中庸之道”、赞颂儒教“五经”、以孝道为戒律和会通佛法与儒术等六个方面。<sup>[10](P545)</sup>据《谭津明教大师行业记》记载:“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聳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仲灵独居,做《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sup>[14](P1)</sup>他认为,性命之学乃佛教的专利,但又是儒释道三者共处的理论基础,儒家于性命之学存在理论不足,只有《中庸》可以弥补儒学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故他力图通过对《中庸》思想的系统阐发,而为佛儒在“心性义理”之学方面的渗透与融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他曾作《中庸解》五篇,系统地阐述了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佛教信徒对中庸思想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认识,以儒家“性命之学”阐发佛学命题:“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sup>[14](P50)</sup>他不仅将中庸思想的伦理纲常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加以认识,强调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而且推广至佛、道领域,“由此出发,整个儒、释、道三家在心性义理这一点上,被彻底打通了”<sup>[15](P375)</sup>。他站在佛学的立场重读儒家经典,从理论上阐述二者的密切关系,既充分认识到儒学修身化民的治世功能,又肯定佛教在“内益于圣贤之道德”“外助于国家之教化”的治心价值。除通过著书立学弘扬佛法外,契嵩还借助上书朝廷以获取支持,弘扬佛法。《谭津文集》中保存有多篇这类作品,如《万言书上仁宗皇帝》《再书上仁宗皇帝》《上韩相公书》《上富相公书》《上张端明书》《上田枢密书》《上曾参政书》《上赵内翰书》《上吕内翰书》《上欧阳侍郎书》《上曾相公书》等,都是为了阐述“儒佛之教,同归乎治”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契嵩儒释融会思想。

提倡儒释融通是北宋前期僧人抗击儒者排佛的

共同方法,而利用对儒家经典的禅学化解读成为智圆、契嵩等禅学大师破解佛教困境的基本手段。他们通过从理论上对禅学和儒学关系的讨论,强调儒释两家在“化民”“迁善远恶”方面的一致性,辨析其一主“治世”、一主“治心”的差异性,从而为儒禅两家思想的融合寻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也为北宋后期士大夫阶层出现禅悦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契嵩的儒佛融通思想在儒学界和宗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佛教一方看,针对儒家效法欧阳修古文而排佛、元和徽宗废佛等情况,大觉怀琏禅师、释永道等或以儒释“道则一耳”劝阻排佛者,或反复阐明佛教“教人为善”“阴翊王度,有功斯民”而劝谏帝王。从儒家士大夫方面言,这一时期包括富弼、张方平、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在内的士大夫文人皆留心释典,热衷禅学,与佛教僧人来往密切。随着北宋中期儒佛“同归于治”“以儒治世,以禅修心”观念的逐步形成,儒禅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为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儒佛进一步渗透、沟通及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大慧宗杲(1089—1163)是禅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僧人,是两宋之交佛教儒学化的代表人物,是使儒释关系发生新变的关键性人物。他促使两宋儒禅互融互摄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他所生活的前期正是禅悦之风盛行,宋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后期则经历金人灭宋、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历史巨变,儒学大谈“尊王攘夷”,从思想领域对佛教展开新一轮攻击的时期。在以二程弟子为主体的儒家排佛浪潮中,宗杲为缓解儒释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关于儒禅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功能上宣扬儒佛一致,二是在伦理思想上强调“忠义心即菩提心”。就前者而言,宗杲提出“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sup>[16]</sup>的命题,强调在世俗生活中修禅学佛。这在南渡后宋金战争背景下直面社会和民族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传统学术思想和儒释关系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后者来看,宗杲以方外僧人的身份提出了“忠义心即菩提心”的观点:“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但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sup>[17](P911)</sup>宗杲是有着强烈社会关怀意识的僧人,在国家民族蒙受危难时也可以挺身而出,和社会融为一体,同时也实现了入世与出世圆融的理想。这体现了其伦理思想鲜明的儒学特色。

“纵观宗杲的禅学,各个时期表现的冷热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忠君爱国之情始终如一。”<sup>[18](P436)</sup>“宋代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sup>[18](P483)</sup>

宗杲的禅法改革得到许多士大夫的支持,从而为南渡前后禅宗儒学化扫清了障碍。但作为佛教中人,宗杲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复兴后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优势:“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谓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弱者谓所乖处轻,而转处少力。虽力有强弱,而所乖则一也。”<sup>[16]</sup>这说明,随着南宋中后期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体系建构的完成,体制更加完备,禅学曾具备的理论优势不再,禅学日趋衰落便不可避免。陈植锷认为:“到此为止,儒学之于佛学,在宋学家手中已经转到了反守为攻的主导地位,释氏传入东土之后长期以来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性理之学,被一古脑儿地搬到了宋学之中,反过来很快落到了自惭形秽的下风。”<sup>[15](P382)</sup>自此以后,儒佛攻守易势,宋代学术形成以儒学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新格局。

南宋中后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全面进入反省与总结的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佛教理论进行全面批判与总结,建构出完整系统的儒学思想体系,并最终登上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标志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家在理论上终于战胜了佛教。这种强弱地位的转换,使得佛教独立生存的空间更加逼仄,因此,攀附理学进一步儒学化甚至道学化,成为晚宋禅学无法逃避的必然选择。

方立天先生说:“中国佛教学者绝大多数在出家以前,是先受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后学习、钻研、接受佛教理论。”<sup>[19](P414)</sup>这种经历,导致两宋禅宗无法割舍与传统儒学的精神联系,从而形成儒中有禅、禅中含儒的学术奇观。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针对两宋此起彼伏的排佛浪潮,一批新型学僧“企图从学理上调和、沟通儒、释,据此来阐发佛说的价值,争取佛教的地位”<sup>[11](P106)</sup>。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学、古文运动、中庸之道、心性义理之学、忠义思想等的深入研究和不断吸收,使佛学不断儒学化,推动了宋代学术的发展和新变,使宋代学术最终形成“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完整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进而影响了两宋诗学建构和诗歌创作的嬗变。

## 二、两宋诗僧诗学的儒学化倾向

儒佛融合交流导致禅宗不断儒学化,也促使两宋僧人诗学和诗歌创作发生重大转型。佛教发展到北宋中叶,进入到文字禅的时代,号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一变而为“文字禅”,僧人写诗、论诗成为一种潮流。僧人的“借诗悟道”与文人士大夫的“以禅喻诗”共同造就了宋代诗学和诗歌的繁荣。

僧人论诗大约起于唐代,皎然《诗议》《诗式》、齐己《风骚指格》《二十式》等都是较为著名的论诗著作。至两宋,随着“文字禅”的兴起,论诗的僧人作家更多,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sup>[20]</sup>收录了文莹、契嵩、道潜、普闻、惠洪、永颐、文珣、宗杲等僧人较为系统、丰富的诗论,另外包括智圆、宝昙、居简、物初、大观等在内的诗僧亦不时发表对诗歌的看法。两宋僧人的诗学思想比较庞杂,就其儒学化倾向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内容上强调儒家传统诗教,二是在文学审美上标举雅正诗学观念。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体现了禅宗诗学在功能和本体论方面,既接受儒家诗学的影响,也尽量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智圆可谓宋初僧人论诗提倡重教化、崇雅正合乎先路的重要人物。与两宋儒者论诗一致,智圆讨论诗歌亦溯源儒家经典,以《诗经》作为写诗的根本原则和标准:

夫《诗》之道本于三百篇也,所以正君臣、明父子、辨得丧、示邪正而已。洎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后世屈、宋、李、苏,建安诸子,南朝群公,降及李唐,作者不一,而辞彩屡变,骋殊轨辙。得之者虽变其辞,而且无背于三百篇之道也;失之者但务嘲咏风月,写状山水,拘忌声律,绮靡字句,于三百篇之道无乃荡尽哉!<sup>[7]</sup>

他强调诗歌应该发挥“正君臣、明父子、辨得丧、示邪正”的功能,提倡诗歌要通过“善善恶恶”而“厚人伦,移风俗”的教化目的。

智圆特别重视诗歌的美刺传统,常常在其诗中表达对儒家诗教的皈依。他肯定新乐府诗人白居易,认为其讽喻诗“下视十九章,上踵三百篇。句句归劝诫,首首成规箴”<sup>[21](P940)</sup>,推崇与他有同样诗学旨趣的保暹:“人文粲六经,四术诗其先。仲尼既云删,炳然列风雅。厥旨幽且微,受之唯子夏。……旨哉《天目集》,四海争传写。上以裨王化,下以正人伦。”<sup>[21](P922)</sup>

受其影响,后之文学僧多强调诗歌创作的教化功能,如契嵩禅师认为写诗作文的宗旨应该是“发仁

义而辨政教”。从此原则出发,他对李白的乐府诗予以高度评价:“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其意尊国家,正人伦,卓然有周诗之风,非徒吟咏情性、咄呕苟自适而已。……观其诗,体势才一思如山耸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穷极,苟当时得预圣人之删,可参二雅,宜与国风传之于无穷,而《离骚》、《子虚》不足相比。”<sup>[14](P207)</sup>他称赞唐僧皎然诗“上跨骚雅下沈宋,俊思纵横道自全”<sup>[14](P260)</sup>。直到晚宋时期,道璨更是将儒禅融合作为自己诗学体系的思想基础,要求诗歌必须密切关注现实社会,有助于世道的治理和人心的教育陶冶:“风雅大道,与天齐休,可兴可怨可群,昔者圣人尝以教其子矣。后世为诗者不本圣人之学,气淫声褻,争相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sup>[22](P515)</sup>他提倡“风雅大道”,重视发挥诗歌具有的“兴观群怨”的传统功能,反对诗坛“浮淫新巧”的形式主义诗风。

惠洪身为高僧,论诗的主题却常常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表明其受儒家传统诗论的影响较深,如其主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认为“《北征》诗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sup>[23]</sup>突出了杜甫忠君的拳拳之心。

“雅正”是两宋僧人诗学共同追求的目标。道璨在《江湖祭云太虚》中云:“始而博之以儒学,中而参之以圣教,终而约之以至道。故其发而为文则浑而厚,变而为诗则雅而正,溢而为骈俪则华而滋。”<sup>[22](P422)</sup>这说明,与儒家学者一样,僧人亦认为雅正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因此它并不否定文辞的价值。智圆便十分重视文的作用:“愚窃谓文之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文之本也;功,文之用也;言,文之辞也。……故愚尝以仁义之谓文,故能兼于三也。”<sup>[21](P921)</sup>在他的观念中,文兼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综合功能。但他对齐梁“永明体”、唐代律诗及“逮于今”的纯粹模山范水而无关“教化”之作,则给予激烈批评:“洎齐、梁而下,限以偶对声律,逮于李唐,拘忌弥甚。故有辞有余而理不足,理可观而辞无取,兼美之难,不其然乎!”<sup>[21]</sup>站在诗文革新的立场,以儒家诗道说诗论文,反对以声律对偶、浮靡侈丽为能的西昆体末流,是其“三教同归”思想在诗学上的反映,具有时代意义,值得肯定。

受儒家传统诗学影响,宋季诗僧物初大观(1201—1268)亦充分认同诗歌的价值和作用:“夫诗之用大矣。君臣庶歌,告功神明,遣往劳还,皆用也。岂徒写景状物以自陶冶而已?”<sup>[24](P776)</sup>他在《无文印序》中谈及无文道璨的作品时云:“余得而备览之,简而足,

繁而整,于理脱洒,于事调鬯。盖假文以明宗,非专文而背宗也。……余谓无文从事乎笔墨间,文采粲然矣。”<sup>[24](P772)</sup>他强调“文”在传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提倡“文字禅”的僧人“以文字为佛事”的合理性加以辩护。这与人们印象中僧人作诗不重视语言,不讲究文采大相径庭。

### 三、两宋僧诗的儒学化

禅宗本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其特征,但在有宋重视学问、偏好读书的社会氛围中,为了赢得话语权力,一些有危机意识的禅学宗师推崇文字禅,并借助诗歌阐扬儒禅融通思想,达成“借诗言禅”“以诗语道”的目的,从而促进了宋代僧诗创作的繁荣。

文人释子相与过从是唐宋时期的一大社会风气。僧诗也成为中国诗坛特殊且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僧号能诗,代不乏人”。宋代姚勉曾有言:“汉僧译,晋僧讲,梁、魏至唐初,僧始禅,犹未诗也。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sup>[25]</sup>但唐代僧诗除齐己、贯休等少数诗僧稍有名气外,难称繁盛,而宋代仅《全宋诗》《全宋诗补》便收录诗僧912人,诗歌2万多首,加上其他辑录,总数达3万首之巨。两宋不仅僧人僧诗数量众多,且有诗文集传世的,据高慎涛统计,仅北宋有诗集传世之僧人便达41家之多。<sup>[26]</sup>南宋亦不遑多让。两宋不仅僧诗数量远远高于唐代,且出现一批堪与士大夫诗人相媲美的诗僧,如北宋的“九僧”、智圆、道潜、惠洪,南宋的宝昙、居简、大观、道璨等,都是当时引人瞩目的诗坛名家。

智圆是宋初站在儒家教化立场说诗论文的代表性僧人,其《闲居编》中多有崇尚教化、美刺现实之作。他曾《湖西杂感诗并序》中如此阐释自己作诗目的:“湖西杂感诗者,中庸子居西湖之西,孤山之墟,伤风俗之浮薄而作也。虽山讴野咏,而善善恶恶,颂焉刺焉,亦风人之旨也。”其“伤风俗之浮薄”,正与《诗大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的儒家诗教别无二致。他通过20首诗充分阐释了儒家礼教的重要性与为人处世的原则。它如《思君子歌》表达作者对具有“开口揶扬皆圣贤,满腹包藏尽仁义。修辞复古振淳风,折滥触鳞章直气”儒者气象之君子的期待;《雪西施》以辩证眼光肯定西施灭吴的功劳;《昭君辞》以“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这样的诗句赞美昭君和亲的伟大贡献,在其身上注入儒家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读史》抒发对申包胥、鲁仲连、伯夷等忠孝仁义精神

的赞美。智圆作诗也始终坚持上逮骚雅、以讽喻为旨,即使惨遭时人嘲笑也在所不惜,其《言志》云:“畴昔学为诗,模范风雅词。立言多讽喻,反为时人嗤。”这体现出智圆诗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的儒学化特征。

道潜字参寥,是北宋中后期最著名的诗僧之一,也是宋代仅有的六位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僧人之一,有《参寥子诗集》12卷传世。方回《瀛奎律髓汇评》评价说:“诗僧宋代首推参寥。”<sup>[27]</sup>道潜从小具有学习儒家经典的经历。他在《秋日西园》其四中对此有过具体描述:“忆昔少壮时,意气摩云霓。游心黄卷间,岂顾白日西。”由于受儒学影响颇深,加上一生多与文人士大夫来往交流,即使出家为僧,其思想亦无法避免时时流露出较为鲜明的儒家色彩,并在其诗中得到体现。其《次韵李端叔题孔方平出斋壁》云:“仲尼道流高千古,老子微言冠百家。”其《南康与曾子宣内翰》云:“遥想英雄济川手,壮怀宁复畏倾摇。”其《赠权上人兼简其兄高致虚秀才》云:“翹然双干秀一门,儒释殊科道无异。一操经术游广文,一事瓶盂寻祖意。功名生死两俱彻,论报君亲各无愧。”此外,他还不忘世情,关心苍生困苦:“寒炉燃豆萁,光焰时起灭。布被拥娇儿,从渠踏里裂。老翁寝不寐,辗转念鹅鸭。篱落易穿窬,狐狸恐惊发。”(《次韵黄子理宣德田居四时》之四)其挚友苏轼《参寥子真赞》说他“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sup>[28](P639)</sup>,可谓知言。清代诗评家查慎行亦认为:“参寥诗却有士气,故佳。”<sup>[27]</sup>可见道潜诗歌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出世僧人的身份,却时时保持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虽然喜与士大夫交往,却常常将目光投射到底层民众,关心他们的痛苦与悲伤。

“僧诗之妙,无如洪觉范者。”<sup>[29]</sup>惠洪是两宋影响最大的诗僧之一,现存诗歌1800余首。他虽然也写过表现佛理禅思的作品,但似乎更擅长表达世俗士大夫的情怀。如《上元诗》:“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青灯映薄纱。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东华。”充满对世俗热闹生活的关注与向往,以至王安石读到“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时,笑称其为“浪子和尚”(《能改斋漫录》)。惠洪的诗摆脱道性的桎梏,以凡心俗性描写自然人性,张扬人类情欲生活。正如覃召文所言:“宋代之后的僧诗渐渐地走向世俗化,并越来越与文人的诗歌融通起来。考察这种风气的变化,仲殊、惠洪的创作实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sup>[30](P178)</sup>其在僧诗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契嵩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之中,如讨论儒家学说的《辅教编》《皇极论》《中庸解》《论原》等,反驳韩愈排佛思想的《非韩》三十篇等。从契嵩的90余篇诗歌的内容看,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景观物的描写和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两个方面,其中亦不乏关注现实的作品,如《感遇》九首之四:

天威不到处,干戈动边鄙。将军奋威猛,英雄势随起。纷纷出榆关,肃肃秋色里。白马冒黄云,清霜厉严旨。少壮羽林儿,务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飞将军,妙略应无比。志在报君恩,岂为黄金死。丈夫身许国,慷慨当如此。宁教太史书,轻笑鲁连子。

此诗描写当边境战事之起,将士奋勇当先奔赴战场的情景,并希望战士能够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忠君报国,表达了契嵩虽然身处世外却心忧天下、忠君爱国的儒家古仁人志士的世俗情怀。后世对契嵩诗歌的关注虽然不多,但评价颇高,如释怀悟曾言:“其所为之诗,虽不甚丰浓华丽,而其风调高古雅淡。至其写志抒怀,有迈世凌云之风,亦可想见其人也。”<sup>[14](P297)</sup>肯定其诗在内容上的“写志抒怀”和风格上的“高古雅淡”,高拔胜迈,绝出古今。

宗杲是两宋影响最大的禅僧,并开创大慧一派。一般认为,大慧派具有独特宗风,一是“看话禅”,二是“忠义心”。宗杲所作诗多属阐释佛禅思想的偈颂、颂古等,其他类型的作品不多,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爱国情怀的表达。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得胜班师回朝,年逾古稀且在病中的宗杲得此喜讯,欣然作偈云:“氛埃一扫荡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间俱了了,当阳不昧主人公。”其欣喜豪迈之情,直与诗圣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媲美。

虽然这类表现“忠义心”的作品在宗杲本人的诗中只是偶尔一见,但对其弟子们的诗歌创作却影响甚著。如其法嗣宝昙(1129—1197)曾作《寄张钦夫之严州》二首,称赞主张派理学家张栻的爱国情怀:“试与专城定著勋,何曾闲冷坐忘君。旧来云梦元无际,此段风流独有闻。世故自怜生仲达,人谁不念故将军。等闲莫露鞭笞手,准拟羝羊或败群。”居简(1164—1246)作《诗挽史魏公》五首,称赞史浩“抱负元惊世”“器业真王佐,词章动帝宸”“递奏逾金石,斯文粲日星”“时方相司马,吾不愧玄龄”,高度赞扬了史浩对国家社稷的贡献。大观(1201—1268)禀承大慧派“忠义”宗风,作《读龙川文有感》赞扬爱国词人陈亮的忠义精神,表达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京洛羶风日日吹,九疑望杳断云飞。请缨雪愤男儿事,

只有龙川一布衣。”元肇(1189—1265)有《上水心先生三首》,用“闻道治平犹草奏,向来持论不和戎。匪伊再人修门去,只有孤忠与昔同”“华发萧骚减带围,可胜忧国更伤时”等诗句,大力赞扬叶适主张抗战、忧国伤时的壮举。善珍(1194—1277)《吴歌》借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杜甫表达自己的忠义忧时之思:“君不见,杜老行吟曲江曲,楚臣羁思靡芜绿。世知忠义铸伟辞,不知正是阮籍唐衢哭。”大慧派诗歌“忠义”宗风在南宋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有明一代。

总体上看,北宋僧人为了自我学术的生存与发展,其诗多借助对儒家圣贤、贤能之士的歌颂和对儒家思想的阐扬,实现禅学与儒学交融会通的目的;而南渡之后,随着宋金民族矛盾的加深和主战与主和矛盾的尖锐,僧人无法置身事外,便积极投身现实之中,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通过诗歌描写民生疾苦,反映政治军事斗争,表达爱国情怀,从而将僧诗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实现了儒禅文化的空前融合。

综上所述,两宋是儒禅全面融合的重要时期。从哲学层面看,两宋儒禅关系经历了从北宋前期儒家学者辟佛反佛的紧张对立,到北宋中后期的禅悦之风盛行,彼此高度融合,再到南宋前期禅宗对儒学淑世精神吸纳,直至晚宋因攀附濂洛学术而渐趋式微的嬗变过程。从诗学层面看,两宋诗僧关注诗艺,留下大量相关论述。其诗学深受儒学影响,呈现出以儒谈诗文,强调道本文末,重视语言文字,追求平淡自然诗风等的儒学化倾向。从创作层面看,“僧号能诗,代不乏人”。其诗歌创作受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两宋僧诗在主题上除阐释佛教义理外,还宣扬忠孝节义,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民生,忧国忧民,具有较强的淑世精神;在艺术上倡导诗歌的禅趣化,虽为禅语,却合诗旨,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向儒家不断靠近的倾向。

#### 参考文献:

[1](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M].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

[2]苏洵.嘉祐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孙复.孙明复小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韩毅.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D].河北大学,2004.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7]释智圆.闲居编[A].卮续藏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8]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中国书店,2023.

[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五)[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

[10]释智圆.闲居编[A].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孙昌武.僧诗与诗僧[M].北京:中华书局,2020.

[12]道潜.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A].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1990.

[13]司马光.司马光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14]陈舜舜.谭津明教大师行业记[A].释契嵩.谭津文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15]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6]释蕴闻.大慧普觉禅师书[A].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1990.

[17]宗杲.大慧普觉禅师语录[A].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1990.

[18]杜继文.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9]方立天.略论中国佛教的特质[A].中国佛教研究[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20]吴文治,编.宋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8.

[21]释智圆.闲居编[A].卮续藏经[M].京都:藏经书院,1912.

[22]黄锦君.道璨全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4.

[23]故宫博物院,编.冷斋夜话[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4]徐红霞.珍本宋集五种(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5]姚勉.姚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6]高慎涛.北宋诗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27]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8]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贺裳.载酒园诗话[A].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0]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M].北京:三联书店,199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